

# 中国民俗文化及教学策略

张 英

Chinese custom culture and its teaching strategy

Zhang Ying

## Abstract:

Custom displays the culture it belongs to. If take the method of teaching second language by teaching customs, the second language learners can not only gain knowledge about target language or acquire language skills, but they can also know the culture of target language and also enhance their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in the process of their language learning. The choosing of custom items in Chinese language textbook and that of custom teaching strategies ought to take the training of Chinese learners'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as principle since Chinese has cultural diversities with the long history, the vast territory and the multi-nationalities.

## Key words:

To cognize the culture of target language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Teaching strategy

## 引言

关于风俗,《汉书·地理志》有这样的论述:“凡民禀五常之性,而有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谓为风;好恶取舍动静无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谓为俗。”在汉代人看来,由自然条件不同而形成的习尚叫“风”,由社会环境不同而形成的习尚叫“俗”。故“美教化,移风俗”<sup>①</sup>是中国历代统治者治理社会、引导民众的一个重要手段。著名的事例如:春秋时代的霸主齐桓公喜欢紫色,由此而引领了颜色观念的变化,打破了仅以“五正色”为贵的传统;汉代文帝痛感厚葬的风气给社会发展带来的弊端,带头薄葬以期改变过度追求厚葬的不良习俗。由此可以看出,在中国古代,风俗所蕴含的文化、所承载的教化功能是非同一般的。正因为如此,中国古代还建立了采风制度。

中国古代称民歌为“风”,官员到民间搜集民歌为“采”。所谓采风,就是朝廷派官员到民间搜集歌谣以了解民情。《汉书·艺文志》记载:“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古代朝廷到民间采集诗歌,目的是了解民风民情以考察时政得失,但从现代人文和社会科学的角度来看,“观风俗”除了可以“知得失”和“自考正”以外,对于文化的认知和跨文化交际,也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特别是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从中国风俗习惯中认知中国文化,通过认知中国民俗文化培养学习者跨文化交际能力,是一条非常生动而有效的语言文化教学途径。本文拟从文化认知、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和文化教学策略等三个层面,探讨汉族地区民俗文化在中国语教学的作用和策略。

## 一、从民俗中认知文化

在中国，从科学的角度研究民俗始自 20 世纪初期。当时一些志士仁人在介绍外国民主思想的同时，把西方民俗学理论也介绍到了中国。“但是，由于战乱、政治等多方面的原因，民俗学研究热点一直处于变化之中。因此，每次起步都往往需要从基础理论做起。”<sup>②</sup>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中国的民俗学研究才真正起步并有了持续性的研究。但是，中国重新起步后的民俗学研究常常徘徊于文本之间，缺少对田野调查的足够重视，因而能够关注并对民间大量存在的活生生的民俗文化进行历时和共时研究的非常少。人们可以感受到各个民族之间风俗习惯的不同，可以感受到同一民族不同地区之间风俗习惯的差异，但却很少能从文化的高度去充分地认知和理解，更缺乏从社会交际的角度加以引导，以至于在汉民族的不同地域或地区之间，因民俗文化差异而产生的交际障碍也时有发生。现实生活中就有这样一个例子：

有一个上海姑娘，大学毕业后留在北京工作，邻居是个北京大妈。大妈觉得女孩子远离父母一个人在北京生活不容易，日常生活中每每照顾这个女孩子。大妈自己家做饺子、包子等有北京特色的食物时，常常给女孩子送去一些。一段时间之后，大妈发现，每次给女孩子送吃的东西，女孩子都要回赠一些小礼物给她。这位北京大妈想，我送给你饺子、包子，只是一份情义，并不图你回报，小小年纪，却这样事故，大妈对此很生气。于是，再不跟这个女孩子来往了。这个上海女孩子的想法是，大妈这样关照，若不表示一下谢意，会让人觉得自己不懂事。对大妈的不快，她难以理解。结果，两个人的友好交往就此中断了。本来两个人交往的出发点都很友善，但结果却出乎意料，双方的友善不仅不被对方理解和接受，反而造成隔阂和误会。这与其说是她们个人交际的遗憾，不如说是因中国南北民俗文化认知缺失而造成的遗憾。因为在中国民俗学研究中，同一民族不同区域或地区的民俗文化还没有被充分研究并用来引导社会交际，以至于南北汉族人群在跨地区交际中因风俗习惯差异而出现障碍。

大家知道，人际交往的方式和习惯，是民间风俗文化的重要内容，而形成这种风俗习惯的深层原因，则与其社会发展、历史文化、思想观念乃至自然环境等多种因素相关。中国是一个大国，不仅幅员辽阔，而且民族众多，加之悠久的历史 and 厚重的文化，不但形成了各个民族间巨大的风俗差异，而且在不同区域或地区的汉民族之间，社会风俗习惯也有很大的差别。因此，当说起汉民族风俗习惯的时候，若以地区代全国，必然会造成文化认知上的误导。就以中国汉族地区的南方和北方来说吧，其民间风俗的差异既大且久。关于这方面的情况，仅举南北朝民歌为证。

中国的南北朝时期，始于公元 420 年，终于公元 589 年。这期间南北方的民歌大都收入宋代郭茂倩编辑整理的《乐府诗集》之中。这些来自乡间的民歌，不仅可以让读者生动地了解民族之间、南北地区之间风土人情的巨大差异，而且还能让人深刻地感受到，中国南北民俗文化差异的历史是多么久远。

在南北朝民歌中，表达爱情是他们共同的主题，或思春盼嫁，或忧伤痛苦。但是，她们的行为方式和表达方式却是那么不同。

门前一株枣，岁岁不知老。阿婆不嫁女，那得孙儿抱。《折杨柳枝歌》其二

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阿婆许嫁女，今年无消息。《折杨柳枝歌》其三<sup>③</sup>

这两首均属北朝民歌。前首诗歌以一个女子的口吻，表达了希望早日出嫁的愿望。感情表达得天真率直，饶有风趣。后首诗歌是表达女子对母亲许嫁而未能兑现的抱怨。前后两首

诗歌写的都是女子渴望婚姻爱情的强烈愿望。表达得都非常直率、大胆而且天真。

同样的思春盼嫁感情，到了南朝女子口中则变成了另外一种风格：

春蚕不应老，昼夜常怀丝。何惜微躯尽，缠绵自有时。《作蚕丝》④

诗歌也是写女子怀春的，但是全诗以春蚕为喻，表明自己不惜为爱情舍弃生命的执着感情。用词用语都非常含蓄。比如：用“丝”谐“思”，“怀丝”就成了双关语，字面外的意思是指对情人的思念。前两句的意思是：春蚕本不应该老，因不停地吐丝而死去，喻自己由于怀念情人而憔悴。后两句意思是：对情人的思念绵延不断，即便死了也再所不惜，以表明自己对爱情的执着。

再如对情人的爽约，南北女子的反应和情感表达也是很不相同的。北朝女子则说：“来与不来早语我”。意思是说：你来还是不来早点告诉我，不要拖泥带水的。而南方女子则充满了缠绵和忧伤：

日暮风吹，叶落依枝。丹心寸意，愁君未知！《青溪小姑歌》⑤

同样的感情，南北的表达和流露的方式的差异是如此之大，北方女子的大胆、率真、泼辣与南方女子的温柔、含蓄、细腻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使我们从一个侧面深切地感受到，南北民风的巨大差异。这种差异不仅仅表现在感情的表达和抒发上，而且也表现在行为的方式上。这种南北不同的民俗文化不仅仅表现在南北朝时代，而是蔓延到整个民风民俗之中，延续到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之中。如果用一个比喻来概况南北差异的话，那么，北方像一个性格粗犷的大汉；南方则像一位灵秀的姑娘。那种“粗豪”与“精巧”的迥异风格，在南北民风民俗中，处处都能够体现出来。

### 1、南北交际习俗

在中国，人际交往之中感到麻烦的一件事是常常不知道怎样称呼对方。这种感觉不只是外国人有，中国人也有。大家知道，中国古代是一个等级森严的宗法社会，人们的亲疏观念非常重，交往中重视血缘纽带关系，而且亲疏分明。一般父系家族比母系家族要亲得多。由此形成的社会交际习俗是：“以老为尊”，“以长为尊”“以男为尊”、“以贵为尊”，称呼和交际方式以及接人待物的态度等都是根据交际双方的身份、地位的尊卑来决定的。官场称官职，民间论辈分和亲疏，同辈论长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普遍以“同志”来称呼，最多加上“老同志”“小同志”。那时候要是谁被取消了称呼“同志”的资格，那意味着他的政治生命结束了。60年代中后期，在文化大革命中“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师傅”成为最普遍的称呼。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小姐”、“先生”“老板”“老总”（总经理）又是最时髦的称呼。这个时期，如果在商店买东西称呼服务员为“师傅”，他们可能不爱理睬你。在与学术及文化艺术有关的领域，则喜欢尊称为“老师”。如果你在在市场上买东西，或者有人向你问路，有求于你的一方常常根据你的年龄称呼你，如叔叔、大姐、大哥、爷爷等等，这种用对家人的称呼来称呼别人的交际习俗，实际上是把传统的血缘纽带关系推而广之，目的是拉近交往者之间的关系，从而使交际的双方更具有亲和力。

上述称呼和交际习惯是就一般而言，如果论及南北的差异，那么相对来说，北方人热情、豪爽、一见如故，交际之中注重亲和关系，特别是东北人，喜欢把亲族内部的称呼运用到社会交际之中，喜欢传统的交往方式，“情”和“利”常常是不分的。而南方人则比较含蓄、理智、注重分寸，交际方式比较贴近现代，特别是在上海这样大的商业都市，“情”和“利”划分得比较清楚，即所谓“亲兄弟，明算帐”。这种交际方式是南方人的普遍习惯，与北方那种

“兄弟不分家”式交际习惯完全不同。

对于外国人来说，了解中国南北交际礼俗的差异，途径之一是乘出租汽车。在中国的留学生，常常喜欢把在北京和上海乘坐出租车的经历进行对比。他们发现，在北京一上出租车，司机就会跟乘客聊起来，话题无所不及，小到家庭或个人的各种情况，大到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天南海北，无所不谈。交谈中，司机是把对方看作熟人、朋友，给人一种一见如故的感觉。在北京的留学生都喜欢跟司机聊天儿，既练习了口语，又了解了中国的情况，一举两得。当然，烦恼也有，当你不想说话时，司机的“多嘴多舌”会让乘客很烦。而在上海，出租车司机的职业角色意识比较强，他只是开车，乘客不说话，司机绝不多嘴，即便乘客发问，司机也是简单回答，绝不像北京的司机，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如果是在交际场合，北方人的热情、豪爽和一见如故的态度很容易让你感到能交上朋友，但是，若是在生意场上，南方人那种含蓄和理智的特点，又会让人感到严谨和塌实。中国有一句俗话：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由地域不同而形成的民风 and 习俗上的差异，是民族文化丰富多彩的表现，对于南北方的差异不能简单地归结于好还是不好，客观地去了解它和感受它，有助于了解中国文化并增强跨文化交际能力。

## 2、南北饮食习俗

中国的饮食文化是非常发达的，仅汉族，就有所谓八大菜系之说：川菜、鲁菜、粤菜、苏菜（也称淮扬菜）、湘菜、浙菜、闽菜、徽菜，其中影响最大、普及面最广的是川菜、鲁菜、粤菜、苏菜（也称淮扬菜）。川菜和鲁菜，属于典型的北方菜，粤菜和苏菜属于典型的南方菜。如果我们仅从一个普通食客的角度来看南北菜系的差异的话，那么北方菜的特点是：味重，料粗、量足，更多地体现于“吃”，比如川菜就属于大众菜。而南方菜的特点则是：味淡，料精、量少，更多地体现于“品”，比如苏菜（淮扬菜）就属于文人菜。

南北菜系的差别，实际上也是南北方民间饮食习俗差异的直接反映。如果你有机会到北方人家家庭和南方人家做客，相信您在饭桌上的感受会是不同的。北方人待客的酒、菜、饭，除了“香”以外，尤为重视“量”的充足，以此显示热诚和好客；南方人则在“香”的基础上，更重视菜的色彩、味道的精美和精巧，更喜欢以“厨艺”来显示待客的热情和真诚。北方人的餐桌上，菜盘层层堆放如山，这种情形在南方则很少看到。

## 3、南北服饰习俗

说到服饰习俗，着眼点自然离不开服装的三要素：面料、款式、颜色。

面料：大家知道，中国北方是棉花产区，南方是丝绸的故乡，加上北寒南暖的气候特点，所以在面料采用方面，北方人传统的服饰面料以棉布为主，南方人则更喜欢丝织品。

款式：南北比较而言，即便是贵为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其服装款式也不能领上海、广州等南方城市之先，更不要说北方与南方的整体比较了。从整体特征上看：北方服装款式注重实用、庄重，风格趋于保守；南方追求新、追求异，风格比较新潮。

颜色：北方更喜欢凝重、绚丽的色彩，比如男装多为蓝、深蓝、黑、灰色，女装的花色或色彩搭配，则喜欢对比大的调配，给人以既凝重又热烈的感觉，这与北方人的性格相吻合。南方更喜欢浅色调，花色或颜色搭配，更倾向于素雅。如果你在中国由北往南旅行，相信你会有很深的感受。

南北服饰习俗上的差异，一方面源于地理环境和气候，另一方面也受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西晋以前，中国文化发展的中心在北方，东晋南迁以后，文化的中心逐渐南移，到了明清以后，无论是商业经济还是思想文化，南方一直走

在前边，即便到了改革开放的今天，南方也是比北方先走一步。这种差异自然也在服饰方面反映出来。

当然，作为同一民族服饰文化的延续，无论南方或北方，还有许多共同的东西，比如服装上装饰——花纹图案。我们平常所说的服饰是包括“服”（服装）和“饰”（装饰）两个部分。装饰有许多手法，主要的有：一是直接在面料上织出花纹或图案；二是在织好的面料上印染、刺绣、或绘出花纹图案。这一点，各个民族美化服饰的手段大体相似，但是用什么花纹或图案来美化，则因民族文化传统不同而各异。在中国，自周朝就已经出现彰服制度，即用十二种花纹定等级和区分文武，期盼吉祥。汉代以后彰服制度逐渐完善，并一直延续了几千年，这一制度对民族服饰文化产生了的影响是：装饰的花纹和图案有独特观念和方法。比如：

利用某物的特性来象征或比喻理想追求，如松树长青，乌龟寿命长，用松和龟象征长寿；鸳鸯雌雄不分，用以比喻夫妻之情。

利用物名与吉祥词语的谐音来寓意吉祥，如蝙蝠的“蝠”与幸福的“福”谐音，用“蝙蝠”寓意幸福；鱼与有余的“余”谐音，用鱼寓意吉庆有余；鹿与“禄”谐音，用“鹿”寓意升官发财。

利用人们对吉祥物的信仰寓意吉祥，如麒麟是传说中的仁兽；龙是传说中的神兽；凤是传说中的神鸟，所以，麒麟、龙、凤都寓意吉祥。

把几种动物或植物的音、意组合到一起，表达吉祥的意思，如梅花、蜜蜂寓意“春风得意”；喜鹊立在梅花枝上寓意“喜上眉梢”；松、鹤寓意“延年益寿”。

直接用汉字来表达美好的祝愿，如寿、福、萬……

这些花纹图案，表达的不仅仅是装饰美，而且包含着中国人对长生不老、多子多孙、夫妻和美、升官发财、吉祥如意、安居乐业、五谷丰登等美好生活的追求和期盼。

#### 4、南北居住习俗

民居是立体的“语言”，通过它的选址、用材、结构、造型、装饰等，可以充分了解一个国家民居文化的内涵。在中国传统居住民俗中，最富有特色的习俗是：选址和布局。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阴阳五行（阴阳：古代哲学中指宇宙中贯通物质和人事的两大对立面；五行：金木水火土，古代思想家以此五种物质说明世界万物的起源）学说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影响非常深远，其对居住习俗的直接影响，就是建宅选址中的“风水”观念的诞生。所谓“风水”，就是根据阴阳五行学说，认为地脉、山水是有一定走向的，这种自然环境的形势能够影响居住者的福祸，所以在选址建宅时，一定得请“风水”先生看看“风水”怎么样，叫做“堪輿”或“相宅”。依山傍水（背靠山、面对水都是阳位）、向阳干燥（坐北朝南为尊位，同时适合寒冷近阳的气候）、趋吉避凶是好住宅的基本要素，人们希望好“风水”带来好运气。现在民间建房依然讲究选址，只是迷信的色彩没有以前那么重。

中国房屋建筑，无论是皇家的宫殿，宗教的寺观，还是园林或民宅，多为群体建筑，或者为一组，或者为一群，孤零零地的单个建筑极少。受宗法社会结构的影响，中国传统家庭有几代人共居、共财的特点，一个家庭至少有一个院落（最典型的为四合院，即东、西、南、北四面房子围合起来形成的内院式住宅），人口多的、几世同堂的大家庭，往往有几重院落。但无论有几重院落，其布局 and 安排都具有如下特点：

整齐：中国传统民居一般为平房，“四合”为一个院落，是基本单位，其扩大的方式是向纵深发展，且一个院落连着一个院落，每个院落称为“一进”，非常整齐。

对称：四合院的布局讲究对称，中间是院子，四周的房屋是大布局，如南北、东西总是对称的，每一组房子的小布局也是对称的，如正房三间，一明两暗，中间叫堂屋，相当于现在的客厅，是接待亲友的地方，也是过节时设供祭祖的地方。东、西两个暗间是长辈的卧室；院子东、西两侧的房称为厢房，也是一明两暗，通常是家庭中晚辈居住的地方。南房称“倒座”，一般做客房或其他用途。

隔绝：四合院的门非常多，门是内外空间分割的标志，所以中国民居非常重视对门的处理。隔绝的功能有两个方面，一是住宅与外界的隔绝，四合向心的院，四合院的大门是隔绝家庭与社会的“关口”，关上门自成一统，家长就是这个小社会的最高统治者，即所谓“内外有别”；二是院子内的各个门，如中门、便门、房门等，起着隔绝家庭内部成员之间的作用，即所谓“长幼有序，尊卑有别”。

主次分明，自成一统：房屋布局主次分明，房屋的使用严格按照家庭内的等级来区分的，长辈住正房；晚辈住厢房；同辈中的年长者住上房（东为上、右为上），年幼者住下房。这种居住习俗是与中国古代内外有别、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的宗法制度密切相关的。

值得注意的是，同为汉族，但南北方的民居是有很大差异的。比如，在住宅选址方面，北方寒冷干燥，喜欢靠山朝阳，南方炎热则喜近水；在住宅建材方面，北方民居多用土、木、沙、石，而南方则除了土、木、沙、石以外，还使用竹子和茅草；在院落布局上，北方地广人稀，庭院宽大，院子里常常栽种果树；而南方地少人多，院子比较狭小，形成天井，院子里以养花草盆景为主；在民居的颜色方面，北方多为灰色，南方喜用白色。

此外，南北方都还有一些独特的民居形式。比如，北方黄土高原有洞穴式的民居——窑洞，而福建一带有军事堡垒式的客家人围龙屋。这些特殊的民居形式和居住习俗都是受独特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影响而形成的。

## 二、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

中国有一句古语，叫做“入国问礼，入乡随俗”。这里所说的“国”原本指的是古代的诸侯国及京城，“乡”原本指的是古代的一种行政区划。《周礼·大司徒》记载：“五州为一乡”。当时二千五百家为一州，按此计算，那么一“乡”则是一万二千五百户。所谓“入国问礼，入乡随俗”，就是告诫人们在跨地区、跨族群交往时，要了解对方的礼仪和习俗，以顺应对方礼俗的方式进行交往。用现代语言来表述的话，就是在跨文化交际中，首先要了解对方的文化习俗，并以适应对方的策略进行交际。虽然古今表述的方式有所不同，但阐述的基本道理是一致的，即在文化风俗背景有所不同的人之间，如果不了解对方的文化风俗，即便语言相通，其交际也常常会因此而出现障碍或误会。特别是在当今跨语言跨文化的国际交流中，这种例子不胜枚举。比如会客、吃饭、打车、见面打招呼等事情，这些在日常生活中应付自如的交际，一旦到了异国他乡，常常会让人感到不知所措，甚至是遭遇尴尬。实际生活中有这样例子：

有一个德国人，受公司的委派到中国商谈合作事宜，中方当晚为他举行宴会接风。按照中国人的风俗习惯，德国客人是宴会的主宾，又远道而来，自然频频给他敬酒，而中国式的敬酒都是有说辞的，即有美好的祝酒辞。这位德国人每一次都被对方的真诚和美好的祝酒辞所感动，尽管他的酒量不行，不能喝那么多酒，但是按照德国的习惯，拒绝的话是失礼的。所以，每一次敬酒，他都欣然接受。而中国人待客的习惯是热情诚恳，特点之一就是饭桌

上不停地给客人敬酒和布菜，一定要让客人吃饱喝足。看到客人不加推辞地接受敬酒，以为他是海量，于是敬得更加热情频繁。最后，那个德国客人醉得一塌糊涂，第二天的商务活动也耽误了。

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双方都是按照自己的文化习惯来进行交际的，由于文化不同，施与或接受的心理动机和行为方式也不同，由于不了解彼此的差异，双方的一片真诚和友好却闹了一场误会。尽管双方交际的动机都是积极的、友善的，但是却没有达到预期的交际目的。由此我们可以深刻地感受到，在国际交往中，仅掌握目的语是不够的，还必须了解和理解与该语言相关的文化和风俗习惯，这样才能够避免在跨文化交际中出现障碍或误会。因此，现代第二语言教学尤其强调培养学习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大家知道，第二语言教学的培养目标有一个演进的过程。早期的第二语言教学是以培养学习者的翻译能力和阅读能力为目标的，教学方法以语法翻译法为主。后来，翻译和阅读典籍已经不能满足跨语言交流的需求，人们需要直接用第二语言进行交际，于是，第二语言教学法便从传统的语法翻法发展为直接法和听说法等，第二语言教学的目标也从培养“语言能力”演变为培养“交际能力”。20世纪后期，随着冷战结束，国际间的交流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广泛，这种日益频繁、广泛而深入的国际交流给第二语言教学的培养目标提出了新的挑战，单纯的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培养不能满足国际间跨文化交流的需求，人们需要既具备第二语言能力又熟悉第二语言相关文化的外语人才，即具有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外语人才。于是，培养学习者跨文化交际能力成为当代第二语言教学锁定的培养目标。这是世界范围内第二语言教学界的共识。

当然，第二语言教学培养目标的演变，除了社会需求的推进以外，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自身的发展也提供了科学基础。因为语言学家和应用语言学家认识到，语言作为社会交际的一个重要手段，“必须有其使用规则，否则语法规则就会没有意义”<sup>⑥</sup>。海姆斯的这一发现，使乔姆斯基的“语言能力”说得到扩充和完善，原来只包含听、说、读、写四项的“语言能力”发展为包含“合语法性”、“适合性”、“得体性”和“实际操作性”等重要参数的“交际能力”，其中“适合性”和“得体性”的实质是语义和语用的问题，这是文化被纳入第二语言教学之中的科学依据，也是第二语言培养目标发展的重要标志。

随着“交际能力”学说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影响交际的因素不只是语义和语用，萨莫瓦尔(L.A.Samovar)和波特(R.E.Porter)曾把影响交际的因素分为三个方面：(1)观察事物的过程，其中包括信念、价值观、态度、世界观及社会组织；(2)语言过程，其中包括语言与思维模式；(3)非语言过程，其中包括非语言行为，时间观念和空间的利用等<sup>⑦</sup>。上世纪60年代以后，“跨文化交际”成为一个重要的科学领域，“跨文化交际能力”也自然而然地成为第二语言教学新的培养目标。与此相关，文化教学的范围、文化教学的方式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这一点，可以从欧美“文化教学”发展的历程中清楚地看到，他们从纯语言型课程到语言与文化兼并型课程、语言与文化融合型课程以及专门的文化课程，从把文化看作是“知识”到把文化看作是一种“行为”，其间的变化都深刻地影响着文化教学的范围和方式<sup>⑧</sup>。

在中国，“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文化教学包括‘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和‘对外汉语文化教学’两个部分，前者所涉及的文化存在于语言形式之中，属于语言的文化要素；后者涉及的文化存在形态大于语言形式。因此，是相关但不相同的两种文化教学。就教学目标来说，两种文化教学的最终目标都是为了培养跨文化交际的能力，但承担的任务有所不同，‘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承担的是存在于语言形式之内的‘文化’，即‘语言的文化要素’

的教学，教学内容和范围应该在‘语言’领域，即属于文化语言学研究的范围，教学的目的是‘排除’语言理解和运用方面的障碍。其教学的方式是以‘教语言’的方式进行。这种教学，本质上是属于‘语言技能’或‘交际能力’的教学。‘对外汉语文化教学’承担的教学内容则大于‘语言的文化要素’范围，教学目的是‘克服’交际中可能出现的困难，以便能够顺利进行跨文化交际。其教学方式既不同于操练性很强的语言技能教学，也不等同于母语环境中的灌输式的‘第一文化’教学，而应该是‘第二文化’教学独有的一种教学方式”<sup>⑨</sup>。

民俗文化既存在于语言形式之中，比如中国传统的婚姻是男“娶”女“嫁”，“娶”、“嫁”两个字隐含着婚姻习俗、婚姻制度、婚姻观念、婚姻形式等多种文化信息。同时，民俗文化也是可观可感并能用语言加以详细转述的文化，比如中国汉族地区南北方在交际、饮食、服饰、居住等不同的习俗，不仅可以描述其不同的形态，而且能够阐释其形成差异的原因。因此，在第二语言教学中，人们已经普遍认识到了解目的国的民俗文化在跨文化交际中具有的重要意义。不论是出版的中国教材还是其他国家出版的中文教材，都或多或少地融入了民俗文化的内容。比如，2002年日本白帝社出版的中国语中级教材《中国与日本》，就是以对比的方式展示中日两国不同的文化和风土人情，把语言和文化融合在一起，使学习者在掌握语言技能的同时，也能够具体地了解和理解中、日之间的文化差异，提高了跨文化交际能力。这种在教材中自觉地融入目的语文化的做法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但是，由于中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悠久的历史文化不仅形成了各个民族间的风俗差异，即使是同一个民族，也会因历史、社会及自然环境等方面的不同而形成社会风俗习惯上有很大差别。比如在汉族的南北方人之间，正如前文所述，不仅日常生活习惯有差异，而且人的性格、行为方式等也有很大的不同。可很多中文教材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常常把某一地域或某一地区的风俗习惯统统冠以“中国”之名加以介绍，使学习者误以为是所有中国人的普遍习惯。比如下面这段课文：

小陈：中国人把过春节叫“过年”。

加藤：一般怎么过年呢？

小陈：春节前先在家里贴年画儿，在门上和院子里贴春联儿。

加藤：对对，我在电影里看过。

小陈：另外，除夕晚上全家人一起吃年夜饭。大部分人家吃水饺。<sup>⑩</sup>

熟悉中国情况的人都知道，过年吃饺子只是北方的年俗，南方的年俗则是吃年糕。另外，吃饺子并不是在年夜饭上，而是在除夕午夜12点与新年零点相交之时，即所谓的“交子”之时，饺子之名即由此而来。教材对此不加说明或说明不准确，造成学习者对目的语文化习俗的误读，一旦带着这种“误会”进入实际的跨文化交际之中，必然给学习者造成挫败感。因此，了解中国南北风俗文化的特点和差异并给学习者以正确的引导，是中文教学培养学习者跨文化交际能力不可忽视的问题。



## 三、文化教学策略

作为第二语言的文化教学，仍然是以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为目标，因而它不是一种泛文化教学，其内容即文化选项，应与培养学习者跨文化交际能力相关，其教学策略，也应以培养学习者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效度为取舍的标准。这些应是第二语言文化教学的基本原则。

## 1. 文化选项和选项标准

通过介绍风俗习惯让学习者认知中国文化并培养其跨文化交际能力，是目前中国语教材普遍采取的一种方式，很值得肯定。但是，在文化选项及内容的表述方面，却鲜有共识性的标准。比如，同是初级中国语教材，其与交际相关的风俗文化选项的共识度却并不高。下面以白帝社、郁文堂、金星堂、同学社、骏河台等 6 家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语初级教材做抽样分析样本，随机选择了 2004 年至 2006 年出版的 6 本教材，以跨文化交际为尺度，考察教材中民俗文化点的数量及分布情况。详情见下表：

中国语初级教材（6 本）民俗文化选项统计表

出版社	白帝社	郁文堂	金星堂	同学社	骏河台	朝日社
教材名称	中国語の並木道	入门中国語	デビュー—中国語	これならわかる中国語	Campus 汉语	中国語@キャンパス
作者	編集部会	戸沼市子	兒野道子等	守屋宏則等	布川雅英等	關中研
出版时间	2005. 3.	2005. 4.	2006. 1.	2006. 2.	2004. 4.	2005. 4.
课容量	共 20 课	共 10 课	共 13 课	共 18 课	共 12 课	共 24 课
文化点	1. 唐宋诗歌 4 首； 2. 传统节日； 3. 名胜古迹	1. 庙会； 2. 饮食； 3. 民族； 4. 名胜； 5. 民居； 6. 太极拳； 7. 风筝； 8. 茶馆； 9. 二胡	1. 数字习俗； 2. 高考； 3. 中国电影； 4. 景山公园合唱团； 5. AA 制； 6. 饮食习惯	1. 姓氏； 2. 谚语； 3. 称呼； 4. 节日	无	1. 称呼； 2. 服饰； 3. 名胜古迹； 4. 中国菜
文化点总涉及量	共 20 项（同项不重复计算）。					
文化点重合率	在 20 项文化点中：饮食（3）、名胜（3）在 6 本教材中的重合率为 50%；节日（2）、称呼（2）在 6 本教材中的重合率为 40%；其余 16 项文化点在同级教材中均为单例。					

从上述统计数字，我们可以得到如下信息：

首先，在外语教材中，目的语文化是必要的还是可有可无的？从 6 本教材的统计数字来看，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并不一致。关于这一点，从 6 本教材的文化点分布就可以清晰地看到。有的教材就是纯教语言，一点文化也不涉及；有的涉及文化，但非常有限；有的则占的分量

非常多，几乎是通过文化来教语言。

其次，教材中文化选项具有很大的随意性，与交际相关的文化点共识性不高。关于这一点，可以从6本教材文化点重合率不高得到印证。

第三，对文化的理解有差异。有的教材把风俗习惯作为重点，比如，《入门中国语》选择的文化点分别是庙会、饮食、茶馆等；有的教材把中国国情作为重点，比如《デビュー—中国語》选择的文化点分别是高考、电影、景山公园合唱团、AA制等。

我们知道，任何教材都应该有自己的个性和特色，中国语教材也一样。但是，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中国语教学的最终培养目标也是培养学习者跨文化交际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教材的文化内容又受第二语言培养目标的制约，因而没有那么大的随意性，这就要求教材的文化内容应按照培养目标来选项，即那些与交际相关度高的风俗习惯，比如称呼、往来、交友、饮食、节日等实用性强的项目，应该成为初级教材首先考虑的对象，一方面可以通过风俗习惯了解中国的文化，另一方面，在提高语言能力的同时，也增强了跨文化交际的能力。因此，应该加强中国语教材文化选项和选项标准的研究，以提高中国语文化教学的效度。

## 2. 防止文化误读

通过风俗习惯了解中国文化，培养学习者跨文化交际能力，是一种不错的途径和方式。但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中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在漫长的社会发展中，不仅各个民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俗习惯和民族文化，而且同一民族也因自然环境和社会发展历史的差异而形成不同的风俗习惯，正如前文所述，仅汉民族南北的差异，就足以成为一门学问，更不要说各个民族和各个地区的差异了。因此，在中国语教学中，防止文化误读是非常重要的。

考察目前通行的中国语教材，发现有这样几种情况：

第一，把某一区域的风俗习惯当作中国整体的风俗习惯加以介绍。比如教材中有这样的对话：

端午节是什么时候？

阴历五月五号，这一天中国人有吃粽子、赛龙船的风俗。①

在中国，端午节“吃粽子”是南北方都有的习俗，但“赛龙船”则因南北自然环境的差异而有很大的差别。南方水多，赛龙船是端午节最具有群众性的集体竞技活动，因而也最热闹和最具有节日气氛。北方水少，不具备形成赛龙船这样节日习俗的自然条件，因而北方的端午节，除了吃粽子以外，节日活动的内容则多为挂菖蒲、艾叶，薰苍术、白芷，喝雄黄酒以避邪、压邪等方面。除了自然环境以外，关于端午节的起源或来历自古有不同的说法，这也是形成南北方端午节文化习俗不同的重要原因。

端午亦称端五。“端”的意思和“初”相同，称“端五”也就如称“初五”；端五的“五”字又与“午”相通，按地支顺序推算，五月正是“午”月。又因午时为“阳辰”，所以端五也叫“端阳”。五月五日，月、日都是五，故称重五，也称重午。此外，端午还有许多别称，如：夏至、浴兰节、女儿节，天中节、地腊、诗人节，等等。端午节的别称之多，间接说明了其起源或来历并非单一性。时至今日，关于端午节的来源至少有四、五种说法，诸如：纪念屈原说；吴越民族图腾祭说；起于三代夏至节说；恶月恶日驱避说，等等。其中影响最广的则

是纪念屈原说，所以在民俗文化领域，人们普遍地把端午节的龙舟竞渡和吃粽子都与屈原联系起来。由于端午节俗起源的歧出和南北自然环境的差异，形成了南北端午节俗文化的差别。如果对南北节俗差异不加说明，很容易给学习者造成文化误读。因此，避免整体与区域民俗文化的误读是文化教学的策略之一。

第二，把历时风俗习惯当作共时风俗习惯加以介绍。比如下面这段阅读课文就是如此：

中国人的婚礼讲究喜庆、热闹。婚礼的当天，用装饰着鲜花的花车接来新娘子，一路开过，很气派。婚礼上要举行“一拜天地，二拜高堂，三是夫妻对拜，喝交杯酒”的仪式，然后双方的上司讲话祝贺。年轻的朋友们或唱唱歌，或让新娘子给点烟、敬酒。实际上想借这个机会，好好地欣赏新娘子的美丽。婚礼场所的里里外外，放烟花爆竹，抛气球彩球，撒花朵花瓣儿，更增添热闹的气氛<sup>⑫</sup>。

这段短文介绍的是中国婚俗。大家知道，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几次历史性的变化，婚俗也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而改变。大体说来，50年代前后是传统婚俗；60年代中期到改革开放之前，社会提倡的是革命化婚俗；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婚俗中融入了西方文化的成分，比如穿婚纱、坐花车、撒花瓣等；90年代以后，随着传统文化的回归，婚俗蕴含的文化更为多彩，既有拜天地、拜高堂、夫妻对拜及喝交杯酒等中国传统婚俗的形式，也有穿婚纱、坐花车、撒花瓣等西方婚俗的形式，还有当代新的婚俗形式，如抛彩色气球等。此外，农村的婚俗与城市的婚俗也有一定的差别，各个地区之间的婚礼习惯也不尽相同。尽管在中国语教材中没有必要介绍的那么细，但若像上述“阅读文”那样，把历时风俗习惯当作共时风俗习惯加以介绍，势必造成学习者对中国婚俗文化的误解。因此，避免时代和地区民俗文化混淆是文化教学应该考虑的策略之一。

第三，文化描述不准确。比如下面一段文字对中国传统民居四合院的描述：

四合院是家族社会的象征。以大家庭的长辈为中心，数代人居住在一个四四方方的大院子里，一来可以对付外来的侵犯者，二来可以互相照应。……<sup>⑬</sup>。

熟悉中国传统民居的人都知道，四合院是由四面的建筑合围而形成的一个封闭式院落，标准的四合院不是“四四方方”的，而是一个长方形。四合院的功能，首要的也不是“对付外来的侵犯者”，而是适应宗法社会“内外有别、尊卑有别、长幼有序”封建理念和价值观的需求，利用其“四合”及“封闭”的特点来“对付外来的侵犯者”，只是四合院的附属性功能，并不占主导地位。上述文化描述的偏误，可能造成学习者永久性的文化误读，这是教材编写者及教师需要特别警惕的问题。

基于上述考察和分析，我认为，通过鲜活生动的民俗文化来教授语言是一个非常好的途径，既可以提升语言教学的活力，避免枯燥，又可以通过了解风俗习惯让学习者认知目的语文化，有效地培养学习者跨文化交际能力，实现教学上的一举两得。但是，在介绍中国民俗文化的时候，必须考虑到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幅员辽阔、民族众多、人口众多的国家，风

俗习惯的民族差异、地域或地区差异、时代差异等都非常大，如果在教学策略上不加注意，就会使教学效率大打折扣，甚至是南辕北辙。因此，对于中文教师来说，加强对中国民俗文化自身的研究，是提高汉语言文化教学能力并增强学习者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重要条件。

注:

- ① 《诗经·周南·关雎序》
- ② 《二十世纪中国民俗学经典·民俗理论卷》p.4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3.。
- ③ (宋)郭茂倩, 《乐府诗集》。
- ④ (宋)郭茂倩, 《乐府诗集》。
- ⑤ (宋)郭茂倩, 《乐府诗集》。
- ⑥ (美)戴尔·海姆斯, 《论交际能力》, 1971年。
- ⑦ 转引自陈天祥“文化语言学兴起及其启示”,《德州师专学报》2000.第16卷(1)。
- ⑧ 陈申, 西方语言文化教学的演变与发展, 《世界汉语教学》1999.(1)。
- ⑨ 张英, 文化和文化因素教学研究 《汉语学习》2006年第6期。
- ⑩ 村松惠子、董红俊 著,《China Now》 P.21, 白帝社出版, 2005.3.。
- ⑪ 三野沼一 等著,《实用中国语八百句》p.196, 同学社出版 1997.4.。
- ⑫ 卢燕丽、濑户口律子 著,《中国文化を歩こう》 P.48 骏河台出版社, 2005.4.。
- ⑬ 村松惠子、董红俊 著,《China Now》 p.30 白帝社, 2005.3.。

参考文献:

- 《中国风俗通史》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1.11.
- 《二十世纪中国民俗学经典·民俗理论卷》苑利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3.
- 《二十世纪中国民俗学经典·信仰民俗卷》苑利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3.
- 《二十世纪中国民俗学经典·社会民俗卷》苑利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3.
- 《二十世纪中国民俗学经典·物质民俗卷》苑利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3.